

從事訓育工作憶述

鄭亨榮

本文係作者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十五日應邀參加中國訓育學會成立二十週年暨會員大會之講詞，茲經作者親自增訂並提供珍貴圖照交由本誌發表，以饗中外讀者。

——編者

談到訓育，我雖然對這一門學問沒有什麼高見。不過我可以說是五十多年前，訓育工作的一個老兵，所以願意把我過去的經驗，略為記述。

我在五十四年前（民國十三年）剛剛從國立廣東高等師範畢業，就應鄒校長海濱先生之聘，擔任高等師範附屬小學的訓育主任。十一年之後（民國廿四年）當我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秘書廳服務時，再度應鄒校長之聘回國，擔任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當時法學院並沒有訓育人員的設置，院長之下祇有一位秘書，因此，這個時候，可以說法學院的訓導工作實際上是我自己負責的。

又過了二十五年（民國四十九年）我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長，從事司法行政工作。我認為獄政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監獄事實上就是受刑人的特殊學校，也是最需要我們去服務的地方。國父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總統 蔣公也訓示我們應該為最困苦和最不幸的人服務。所以，我到了司法行政部之後，首先着手改革獄政，「監所學校化」是我就職以後，一直在推行的重要措施。可以說我是這個特殊學校的一個訓導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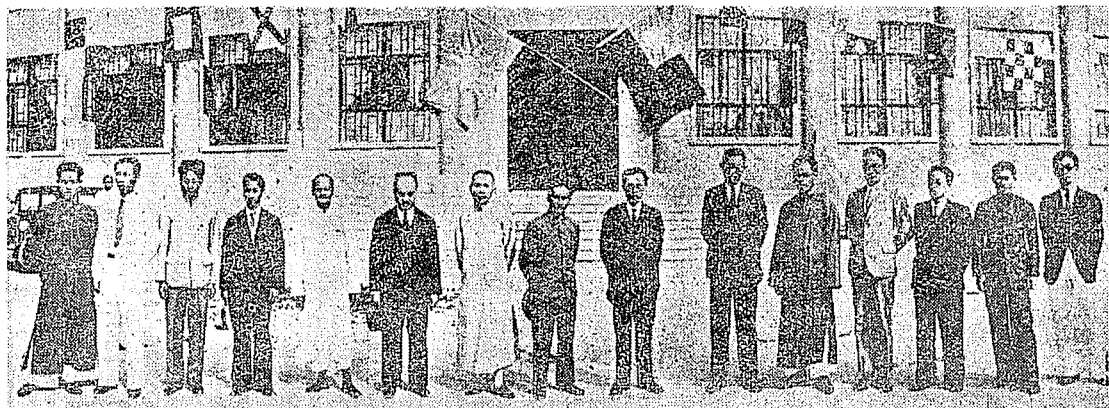
。我記得就任的第一天，就到台北監獄去巡視，以後我每逢過年過節或是休假的時候，我都會到監獄裏去看看他們。當我六十歲生日那天（農曆新年初一），我離開台北到了嘉義，特別跑到監獄去向受刑人賀年，祝他們重新做人。

我們對於監獄裏的受刑人，應該看作是醫院裏的病人一樣，要設法醫好他，要把他救回來，使之恢復為健全的人，這才是我們設置監獄的真正目的。所以我在司法行政部的期間，把對受刑人的訓導，當做一項重大的工作。

總統 蔣公真是非常偉大，他對事情的看法比我們高遠得多，一般人都以為訓導工作，只是在學校裏頭來實施的，但總統 蔣公告訴我們，不僅在學校，即使在機關也一樣要做，而且必須做。他在四十二年前，在一次紀念週上，曾經有這樣的一段話，他說：「大家要認清我們辦事的機關，就是一個學校，長官就是這個學校的先生，一般部屬就是學生，我們一定要上上下下都本着『機關學校化』『工作教育化』的原則，一致奮勉，共同努力，然後辦事的效能，才可以大大

的增進。」我對於總統 蔣公這一寶貴的訓示，非常的信仰。因此，多年來，我在主持的機關，不管是抗戰時候的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廣東政府的秘書處、來臺以後的僑務委員會、司法行政部，直至現在的總統府，我自己都以校長自居，並擔起機關中的訓導工作。總括的說，我從高等師範畢業以後，一路到現在，大體來講，可以說都沒有離開訓育的崗位。現在，讓我談談過去擔任訓育工作的一些實際經驗。

首先，談談我怎樣做小學的訓導主任。當時廣東高等師範的附屬小學，是廣州市規模最大的一間小學，現在一個小學幾千人不算得什麼，可是在當時我們的小學每年級有三班，一共有十八班，一千多學生，也算規模相當大了。一個小學的訓導人員應該做些什麼呢？我覺得要做好小學的訓導工作，訓育人員首先一定要多多和學生接近，我們不但要認識學生，而且也要讓學生認識你自己，這一點非常的重要。不久以前，我接到當時小學的一位同學的來信，自然現在他已年紀很大，事業也很有成就，他在信上說：「老師，



本作文者鄭彥茶教授(中)立穿山中裝(右)手持帽者(中山大學鄉村服務實驗)區時與法學院同仁合影。

我在當你學生的時候，我是最怕你認識我的。但是很奇怪，我有一回走過老師宿舍的外面（我住的地方是木造房子，就是現在日本式的木屋，在玄關能看見屋外），您竟然叫出我的姓名，問我現在是幾點鐘了？我覺得很奇怪，怎麼老師竟能記得我的姓名呢？所以我從那個時候起，真正正、規規矩矩不敢亂動。」從這個例子可知，認識學生是很重要的。但單單認識學生還是不夠的，同時也要讓學生認識你、接近你，接受你的指導，這樣，訓育工作，便會事半功倍了。因此我從任事之日起，便住在學校裏頭，這時候我還沒結婚，剛剛二十二歲。我不但在學校，還同寄宿生一起在飯堂吃飯，按週輪流和一桌同學一起吃，每天朝會及升降旗我都一定參加，每逢禮拜天或其他假日，我一定分別輪流陪一班學生到郊外旅行或是到市內去參觀，希望藉此能與學生做到親愛精誠，「亦師亦友」的境地。

我現在還記得，我任事不久，對四年、五年、六年這三級的學生，我大體都認識了，所以工作也比較順利。我以為學校的訓導工作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輔導學生自立自強，而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學生能夠自動自治。

我剛才說，只有我一個訓導主任，怎麼能管這樣多的學生呢？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們國父在民權主義裏所說，中國幅員這樣大，人口這麼多，中央政府如何能一路管通？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主張一定要實行地方自治。國父認為訓政時期，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要先完成地方自治的任務，這樣到我們實行憲政的時候，便

非常的順利。現在我們憲政實行已經三十年了，為什麼到現在還有許多憲政問題呢？就是我們在三十年前，實行憲政時，因為共匪叛亂，尚沒有把訓政時期地方自治的工作做得很圓滿。假定全照國父的遺教，把訓政工作做得很好的話，那三十年來我們的國家不曉得變成怎樣一個理想的國家了。

我對國父這個訓示，非常的信服，我覺得在一個學校推行訓育工作，也應該用自治的方法來訓練學生自治，以推動我們的工作。因此，我便仿照當時廣州市政府的組織，設立「學校市」，來推行學生的自治工作。原來廣州市，只有一個市政廳，而不是一個市政府。民國十年二月改制設市政府，由孫哲生先生任市長，他就任之先，根據國父講民權主義時所介紹美國克利浮萊城，最新的地方自治組織，來擬訂了廣州市政府組織條例。在市政府之下，分設：公安、工務、財政、教育、衛生及公用六個局，來推行市政。我們現在的市政府的組織差不多。因此，我便鼓勵和指導學生仿照當時廣州市的組織來成立「學校市」，由他們自己管理自己，另外成立一個輔導處，由我自己當主任，去輔導他們推行「學校市」的自治。也就是說，以自治的方法，來推動我應該做的訓導工作。這個「學校市」也設有市議會，市長是由四年級以上的學生投票選舉產生，市議會議員則由各班推選，開會都遵照民權初步規定進行。

當時學生們對自治工作都很認真。記得選舉市長的時候，由同學公開來競選，每年級推選一

個候選人，大家公開投票。投票之前，也公開演說，發表政見，一切進行也非常的認真、熱烈。開會則遵照民權初步的規定。當時國父的民權初步刊行不久，廣州的學生團體多已切實奉行。至於市長競選，當時有一位四年級的女學生，也參加競選，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個學生是江西人，名叫李尚賢，聽說現在已經過世了。但是當時市政府下六個局的局長，有些人現仍在世，而且很有成就，好像教育局長就是中外聞名的作曲家——黃友棧教授，他當時是六年級學生，他的字寫得非常好，文理也很通順，服務精神亦相當好，所以當時被選聘為教育局的局長。還有，當時學校也有合作社組織，但不叫做合作社，叫做販賣部。當時主持販賣部的，就是現在招商局總經理張恩駿先生，他當了幾年的總經理，把招商局更新了，而當時則是小學販賣部主持人，給同學們賣書刊糖果。我舉此二例，可見當時同學們很認真的「選賢與能」，而被選出來的人也很認真服務。當時「學校市」的工作，是依照分工合作的原則，由各局來分別執行。不單是訓育的工作，大都交由他們自己去辦，連學校的有些事務也由學生自己來辦。例如，教育局負責籌劃全校學生的課外活動，如旅行種種，還編寫壁報，報導學校新聞。公安局負責維持校內秩序，每天學生出入，不要我們訓育人員來管，由他們派人在門口來站崗糾察。公用局要辦理學校環境美化工作，同時每天學校升、降旗和更換日曆牌等事，也由他們辦理。衛生局負責維持學校區域清潔，和照料同學健康等等，其他我不多說了。我還記得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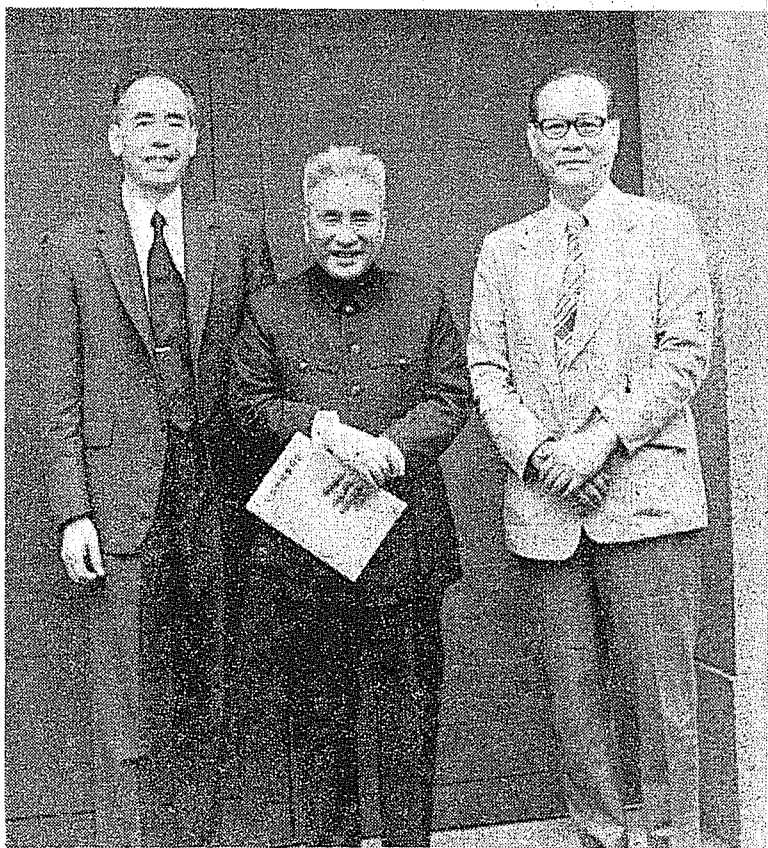
樁事情，是我特別要同他們說明的，就是上下課打鐘，當時設備尚未電器化，沒有裝電鈴，上下課只有打鐘，原來是由工友擔任的。我要求他們不要工友來做這一工作，由他們自己來做，並在朝會把道理解釋給他們聽，我說，如由工友打鐘，那你們上下課是被動的，像是學校命令你們，你們非服從不可，但是你們自己去打鐘就不同了，這是要使你們知道讀書是自己的事，什麼時候應該上課，什麼時候應該休息，到時由你們自己去辦，這雖然是一樁很小的事情，但是頗富教育意義。我覺得這樣一來，可以提高學生的自尊心，對於訓育工作之推進，也有很大的幫助。現在我回想起五十四年前擔任訓導主任，倡導設立「學校市」，以學生自治的方式，來推進訓育的工作，可以說是有一種很有意義的作法，也是相當成功的。

現在，我要同大家談談我怎樣擔任大學生的訓導工作。我當中山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是民國廿四年，這是鄒校長海濱先生特別打電報要我從國際聯盟辭職回到母校，來接受這個任務的，這時候我在日內瓦國際聯盟做事待遇優厚，地位也很清高，但校長要我回來，我當然回來。大家也許知道，民國廿四、五年，正是七七抗戰的前夕，這個時候學生的思想是相當複雜的，尤以大專學校的學生，組織也非常的龐雜。我記得在當時全國各地反共抗日的情緒，相當高昂，尤其是廣東和西南各省對反共抗日的見解同中央的看法有點距離。因此，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做法學院的訓導工作真是絕不簡單的。一般來說大學裏頭，最容易

出毛病就是法學院，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是不是這樣。當時在廣東的大學最麻煩的就是法學院，好在這個時候我還年青，還可以用全副精神來應付這個複雜的局面。如何應付呢？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記得有一天，我一早從家裏到學院來，一到學院，發現反共抗日的標語貼滿了各處，課室裏却一個學生都不見，我覺得非常奇怪，這是為什麼呢？因此我覺得自己一定要弄清楚它。作為一個法學院的院長，對這樣一個出乎尋常的情況，都不知道為什麼，老實說我心裏非常難過，甚至有一點慚愧。所以，當我查悉他們正在禮堂前面的操場集合，便馬上趕去，學生們告訴我，他們準備去遊行示威。目的是為了表示中山大學的學生要抗日，同時對我表明他們一定遵守校規，一定愛護校譽，而且還一致舉手歡迎院長來領導。這時我本來是不贊成他們去遊行示威的，我認為表示抗日不一定要遊行，但當時的情勢，要打消他們的遊行已不可能，與其讓他們自己去行動，不如自己去參加，和他們在一起，以免發生越軌行動。因此，我說：「好！我就同你們一起去，不過，我要和你們約法三章，第一、你們不得中途離開隊伍。第二、你們一定要有始有終，不能夠有越軌的行動。第三、不要作有損壞學校名譽的事，一切行動只能夠以抗日宣傳為範圍。」他們說：「好，我們一切聽院長的。」這樣，我就領導他們一起去遊行。這次遊行走了二、三個鐘頭，從我們學校所在地的石碑，一路到沙基，然後回到文明路，老的高等師範，果然沒有出事情，他們沿途很熱烈，喊口號，真的沒有一人出列，

就原隊返回學校，我覺得非常高興。這說明我們要做大學生的訓導工作，一定要自己以身作則，來積極的領導他，勸導他，才可以防止不幸事件的發生。但是，這次我的突然參加，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因此使少數左傾和企圖搗亂的學生不敢妄動。但不久，這些左傾的學生，奪取學生的

領導權，隨後又有第二回的遊行，這回我因事沒有參加，便出了問題，當遊行到廣東省政府教育廳門口，忽然衝突起來了，學生們把教育廳的招牌也拆下來，後來外間傳說，他們搗毀了教育廳。因為這件事情，當時曾經參加的黎東方教授還被公安機關抓去，審問他是不是領導學生搗毀教



本文作者鄭彥棻先生（中）與當年學校市教育局長名作曲家黃友棟教授（左）合影。

育廳，後來還是由黃季陸先生等出面保他，才無罪獲釋。我還記得，事後不久，當時的廣東最有權勢的人，陳濟棠（伯南）先生，他還請了中山大學一些教授到省政府去宴會，席間和我們談的，也是爲了這件事情。實際上，這和東方先生是沒有關係的。後來東方先生寫了一篇文字，也談這件事的經過，不知在座諸位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我們要了解當時大家對日本的侵略，非常痛恨，抗日情緒很激昂，如果我們不及

時予以誘導，使他們愛國熱誠得有機會發揮，很可能引致他們越軌的行動。有鑒於此，我便向鄉校長建議，舉辦中山大學鄉村服務實驗區，因為我們的學校是在郊外的石牌鄉，附近都是鄉村，而我們建校的時候，把他們的農地都收購來用，甚至有些房子也要拆掉，鄉人思想守舊，認爲中大建校使他們有所損失，因而懷恨在心，開始的時候，農學院的一位教授，曾被他們綁起來毆打，造成學校和鄉人的感情非常惡劣，所以我建議校長，組織一個中山大學鄉村服務實驗區，爲我們大學所在地的石牌附近十個鄉村來服務，一來可以輔導有能力，有抱負的學生，讓他們有表現的機會；一方面也可以改善附近鄉村農民的關係。校長接受我的意見，指示現任師大教授崔載陽先生和我，負責起草計畫。因此，在我到法學院就職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民國廿五年，成立了一個中山大學鄉村服務實驗區。從附近十個鄉村作起。我們先設立一個辦事處，作爲領導的中心，以下每一鄉村分設一個分區，作我們實驗服務的工作單位。另外，我們還設有六人的輔導委員會，以六個學院的院長來做輔導委員，然後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在各學院裏就與學生比較接近，對鄉村工作有興趣和對反共抗日有熱忱的教授，選聘了二十四位做顧問。我自己則被校長聘爲辦事處主任，可以說是實際負責推動這個工作的。我們用很多方法，鼓勵學生自動來參加，當時在這號召之下，有一七〇個學生自動來參加，文理法農工醫六個學院都有。在一百七十個學生當中，固然多數是純潔和熱情的學生，但也有少數左

領學生和投機份子，但我覺得沒有關係，只要我們能以熱誠和正當的方向來領導他，慢慢地還是會跟着你走的。

我們把一百七十個學生分配到十個鄉村，大的鄉村，人多一點，重要的鄉村，也分配多一點，看這個鄉村的情境如何，如它需要文科，便多派幾個文科的；如需要工科的多一點，就多派幾個工科的；看看這個鄉村需要服務的是什麼，來選擇我們分發的人員。當時參加這個工作的教授，就有剛才所講的崔載陽先生，和現任中興大學教授的劉求南先生。還有來台後已經過世的，有師大的范錡先生，和本省丘念台先生。至於參加的學生，我只舉出幾個：如蘇錫文先生，現在是香港中外畫報的社長；梁兆康先生，是政戰學校的教授；潘衍興先生，是立法委員；蔡長本先生，是台中靜宜學院的教授；當然參加的學生中，現在在社會上有很好地位及表現的還有很多。

我們的工作怎麼樣呢？是本着三民主義的原理原則來推動的，比方：在民族主義方面——我們教他們自衛的常識。因為當時日本的軍閥隨時都有侵略廣東的可能，所以我們教他們懂得如何自衛，後來日本的軍閥真的打到廣東來，打到石牌，我們學校附近，據報告，當時參加我們鄉村實驗區的農民、鄉民反抗最烈，犧牲也很多，可見我們當時的服務工作是很有效的。在民權主義方面——我們教他們如何自治，而且告訴他們一點關於政治的知識。關於民生主義方面——如交通方面的建設，簡單的水利工程，合作事業、農林園藝、康樂活動等等，可以說都是以三民主

義為範圍。每一期我們工作二十週，大約五個月。大部分是利用假期及課餘來進行。由於同學們活力非常充沛，工作又熱忱努力，加上當地民衆的通力合作，很快便使沉靜寂寥的十個鄉村，呈現了活躍而熱烈的氣氛。根據各分區的報告，他們實施的重要工作項目，屬於民族主義方面的，有開辦民衆夜校，設立閱書報處、福利的種痘工作、救護的常識、辦壁報、推行清潔運動、國術研究會等等，屬於民權主義方面的，有教他們如何開村友會，怎樣開鄉民大會，並設立法律的顧問處，幫助他們來爭取民權，鼓勵他們演講比賽，以訓練他們站起來能夠講話。在民生主義方面，我們輔導他們組成各種互助會、遊藝會、開關公園和校園，進行農村經濟的調查、農業貸款、農業品種和施肥的改良，開闢鄉村的道路，與及為他們解答各種生活的問題。

我們在第一期工作結束的時候，特別舉行一個「十鄉村村友聯歡大會」，在我們中山大學大禮堂舉行，邀請十鄉的父老子弟們來參加，熱烈得很，到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從前他們是反對學校的、仇恨學校的，這一天他們把農村收穫的瓜啦！果啦！甚至豬啦！一起帶到學校來，獻給我

們的校長。從這裏可以證明農村人是能够接受新知識的，也能够與學生合作，只要我們不自高身價，不要高高在上，樂意和他們一起工作，他們是非常高興的。

在工作同人的報告當中，他們鄉村的民衆，有時看見我們同學在大雨淋漓的時候，還是去指導他們，曾使他們感動到流淚。由於學生參與鄉村服務，我覺得對服務的學生，和參加的鄉民來說，都可以說是德智體羣四育並行發展的一個最好機會，也可以收到實際的效果。我們單就訓育方面來說，也達成了下列四種要求：第一、使得各學院的學生團結、互助、合作，這就是現在所謂團隊精神，在這個工作裏頭是很有作用的。第二、養成爲民服務的精神，這也是現在所要求的。第三、使知識青年與鄉村民衆能够結合在一起，把彼此的距離縮短。第四、使學生的潛力有正當的發展機會，這樣一來，可以減少學潮，而且積極方面使得社會獲得安定。

我認爲對大專學生的訓育，固然應該以「服務爲領導」，但是也應該以「寓訓育於服務」，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一點感想。

(下期續完)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等佳作拾餘萬言，附以珍貴圖照，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